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王中江
编

金岳霖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王中江
编

金岳霖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岳霖卷/王中江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

ISBN 978-7-300-18881-2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金岳霖 (1895~1984)-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3028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金岳霖卷

王中江 编

Jin Yuelin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39.25 插页 2	印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626 000	定 价	94.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 言

“实在”和“完美”的信念

——金岳霖的“实在主义”和“新玄学”

有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他的哲学追求世界的实在性，他的生活追求人生的完美性，他就是金岳霖（1895—1984）。

金岳霖的哲学称得上是实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一种高度结合。一方面它是高度理化性的实在主义，另一方面它又是非同寻常的理想主义，这两者在他严密的体系化哲学殿堂中浑然一体地存在着。他的哲学殿堂是以类似于剥葱的逻辑和分析技术建造起来的，外观富丽堂皇，本身就是西方哲学影响中国哲学的产物，或者用新的方法建设中国新哲学的结果。

金岳霖在《知识论》中说，如果有谁一定要在他的知识论上安装上一个什么主义，似乎“只能”被称为“实在主义”。金岳霖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同样是以“实在”为逻辑世界和形上世界的根本。在东西方哲学中，我们遇到过不同的实在主义，有古希腊柏拉图的实在主义，有现代欧美的新实在主义，还有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不同实在论。金岳霖的哲学是属于哪一种实在主义呢？大致上更接近于西方现代的新实在主义。金岳霖坚持认为，逻辑、知识和形而上的对象都是实在的，只是逻辑的对象是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形式（“式”），知识的对象是共相的理，形而上的对象同时包含着前两者，还要再加上构成所有事物基质的材料（“能”）。金岳霖同新实在主义的最大不同点，是他在世界范围内反叛形而上学的大趋势之中，逆势建立了实在主义的形而上学或“新玄学”体系^①，并在这一体系中塑造了一种终极性的价值和信念。

^① 金岳霖在最初发表的一篇小文中，就提出了他对“玄学”的立场。他区分了“旧玄学”与“新玄学”。参见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15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他的哲学殿堂内部色彩鲜明，是一种以探求“实在”和“完美”为特质的哲学。他的逻辑学以“本来的逻辑”为目标，以“必然的得出”为旨趣；他的知识论穷追知识的客观性基础，相信“真命题”没有程度；在形上理想上，他渴望“至真”“至善”和“至美”，还增添了一个“至如”。在现代中国哲学家中，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在这一方面可同他相比，相比于西方任何一种体系化的哲学来说，他的哲学也是非常精细和精致的。

一、倾心“万人敌”：从“商业”到“政治”

有人可能会问，金岳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套哲学，难道他天生就是一位这样的哲学家？有人断言，哲学就是哲学家性格的产物。“温厚热情，有一副给人好感的气质，几乎普遍为人所爱戴”^①的詹姆士（William James）就说：“哲学史在极大程度上是人类几种气质冲突的历史。”^②照此说来，哲学家的血液里流动的就是他们彼此对立的先天“意识”。谈到熊十力的哲学，金岳霖曾经有一个评论，“他的哲学背后有他这个人”^③。金岳霖的哲学“背后”是不是也有他这个人？是的。他曾这样说：“各思想家有‘选择’的余地，所谓‘选择’者，是说各个人既有他的性情，在他的环境之下，大约就有某种思想。”^④这也是金岳霖对他的哲学的一种自我解释。

说到金岳霖的哲学之路，我们要从他的经历说起，先说他小时候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主人是一位十足的洋务派官僚。金岳霖祖籍今浙江省

①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册，3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② [美] 詹姆士：《实用主义》，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把形而上学看成对莫须有者的“表达”而不是实证意义的“表述”的卡尔纳普，也从这方面看待热衷于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一元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是表达一种和谐的与平静的生活方式，二元论的体系可以是表达一个把生活看作是永恒的斗争的人的情绪状态；严肃主义的伦理学可以是表达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或者表达一种严厉的统治欲。实在主义常常是心理学家称之为外向的那种性格类型的征象，它是容易与人和物发生联系为其特征的；唯心主义是一种对立的所谓内向的性格类型的征象，这种性格倾向于从不友好的世界退却而生活在它自己的思想和幻想之中。”转引自[美] M. 怀特：《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哲学家》，2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③ 张岱年：《忆金岳霖先生》，见《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3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④ 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选》，27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诸暨市。诸暨始设县于秦，隶属于会稽郡。金岳霖的祖父是金春生，父亲是金聘之，母亲是唐淑贤（湖南衡阳人），称颂家庭主妇的“贤惠善良，持家有方”的美德她都有。金岳霖的父亲是盛宣怀的部下，大概是三品知府的级别。在晚清风气的影响下，金聘之热心洋务，曾担任过湖南省铁路总办，也担任过黑龙江省漠河金矿总办。金聘之一共有九个孩子，七个男孩，两个女孩，金岳霖排行第七。金聘之对他的孩子们的期望，是科举功名再加上技术和实业，实际上他也是这样要求的，但结果似乎不那么成功，尤其是就金岳霖而言。

金岳霖出生于湖南长沙，生年是甲午风云的1895年（8月26日，农历七月初七日）。据说，他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骑马回家，在路上遇到了一条蛇，于是就给他最小的儿子起名“龙荪”。“岳霖”是哲学家的号。金岳霖一生的大半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这期间的前一阶段他是被别人教育的，后一阶段他是教育别人的。他的博士论文《T. H. 格林的政治学说》后面附的个人简历说：“这部专著的作者生于中国湖南。赴美前他曾就师于明德学校、雅礼学校和清华预备学堂。1917年他毕业于宾州大学，并于次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硕士论文为《州长的财政权》。在哥伦比亚大学他从师于邓宁、鲁宾逊（Robinson）等教授。”^①

在学习经历中，1901年，7岁的金岳霖，开始在长沙明德学校读小学。这是胡子靖私人出资开办的一所学校。从13岁开始，他进入长沙雅礼学校读中学。这是教会办的很有派头的一所学校。据称，他从小记忆力就强，晚上做梦背“四书”，他姑姑拿书对照，发现他背得一字不差。1911年夏，他报考了清华学堂的高等科，他说他靠英语上的才气和数学、国文上的运气（前者题太难大家都不会，后者碰到了自己熟悉的），得以顺利过关。清华学堂原是“游美学务处”附设的“肄业馆”，是清政府1909年使用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设立的。1911年2月它被改为清华学堂，学堂分中等、高等两科，学制八年，各为四年。这是一所位于中国的美国式学校，连罗素参观后都感叹说：“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学生们未出“洋”先已“洋化”了。^②

1914年，金岳霖结束了清华学堂的学习生活到美国留学。在专业

① 《金岳霖学术论文选》，1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② 参见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27、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课选择上，他特意征求他五哥的意见。他五哥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建议他选择簿计学。他接受了这一建议，就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商业。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的沃顿商学院，它创立于1881年，是美国第一个大学商学院。3年后，金岳霖在这里获得了商学学士学位，但这又是他告别商学的开始，原因是他对商学没有产生兴趣。注重实用的当今中国人，更可以说他不懂得现实。可他不如如此想，他给他五哥写信时这样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也！”^①这是金岳霖从务实走向务虚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他从注重实践智慧的政治学最后走到了坐而论道的哲学和逻辑学。

为了学“万人敌”，他选择了政治学，并转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他的硕士论文是《州长的财政权》。在哥伦比亚大学，邓宁的政治学说史课程把他带入了政治思想史中，这离哲学只有一步之遥。他对格林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兴趣。在格林的政治思想中，他遇到了休谟，也遇到了形而上学。格林触发了他理智上的灵性，他回忆说：“我最初发生哲学上的兴趣是在民国八年底夏天。那时候我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我在政治思想史底课程中碰着了 T. H. Green。我记得我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底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底道旁。”^②1920年，他以《T. H. 格林的政治学说》为博士论文获得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但这又是他逐渐同政治学分手的开始。

二、从“政治”到“哲学”

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后，金岳霖先是到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做短期授课，然后回国为母亲奔丧。1921年底，他赴英国游学，追随瓦拉斯（Graham Wallas）和巴克（Earnest Barker）。这两位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当时金岳霖正在哥大念书，金岳霖说瓦拉斯这个人非常可亲^③，这是他在英国“以师相待”的人。但在这里，他

① 金鼎汉：《缅怀我的叔父金岳霖教授》，见《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36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② 金岳霖：《论道·绪论》，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③ 参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54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的政治学习经历很短暂，因为他很快迷上了哲学。他告别了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告别了瓦拉斯，也告别了之前他在哥大步入的政治思想史，将自己的兴趣转到了哲学上，一生钟情于此，痴迷于此。

金岳霖回忆说，他开始接触哲学时，有两部书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一部是休谟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这是他在研究格林的政治学说时就接触到的。他精心阅读这部书，这部书“给他以洋洋大观的味道”^①。休谟是欧洲近代哲学中的著名怀疑论者。在欧洲，他提出的怀疑惊醒了独断论者，惊醒了康德，现在又触动了东方学人金岳霖。金岳霖还专门提到，他没有把“休谟”的英文名字念错，他是故意这样念，“休谟”两字的用意是“把所有的‘谟’都怀疑掉了”^②。金岳霖只接受休谟怀疑的问题，不接受他对问题的结论。金岳霖称，休谟的问题在理智上折磨他好长时间，让他苦恼甚至痛苦。

金岳霖的知识论整体上可以说是为了回答“休谟问题”而建立起来的。至于金岳霖如何回答的“休谟问题”，同他读的另一本书有关，就是罗素1903年出版的《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这本书给金岳霖的影响主要是方法上的——即“分析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金岳霖说：“哲理之为哲理不一定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③金岳霖在哲学上突出逻辑分析这一方法论特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他解决哲学问题的利器。

有了这一利器，他还需要更根本的哲学信念，这是决定他一生哲学的实质上的部分。在这一方面，他走上了剑桥的哲学之路，而不是牛津之路，他倾心于罗素和穆尔的“实在论”，无怨无悔，就像他的爱情那样。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的思想改造以后，金岳霖依然说：“在宇宙观方面(也可以说世界观，不过不局限于人的社会而已)，我仍然是实在主义者。”^④

① 金岳霖：《论道·绪论》，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②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57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③ 金岳霖：《论道·绪论》，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④ 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68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金又回忆说：“我的实在主义是从早期的罗素、穆尔那里来的。这两位先生都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下变成了马赫主义者。穆尔没有著书立说，但是他上维特根斯坦的课，曾同我一道听讲。看来他们都放弃了实在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没有实在主义和实在主义者，我不知道。”（同上书，68页）

在英国游学期间，金岳霖还同穆尔一起听过维特根斯坦的课。他说他从奥人维特根斯坦和英人袁梦西（Frank P. Ramsey）那里知道，他景仰的数学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逻辑与此类似，是因为“逻辑命题是穷尽了所有可能的必然命题”。这成为金岳霖逻辑学上的一个出发点。当然，他受到的影响不止这些，但这些东西具有根本性。

1925年底，金岳霖从欧洲回国。1926年，他任中国大学教授，讲授英文和英国史。同年，他到清华大学任教和从事哲学研究，创建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并担任系主任。抗战时期，他先后任教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复员北归，金岳霖重新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期间又曾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全国主要的哲学系都合并到了北京大学，金岳霖也到了北京大学，并担任系主任。1955年，他又被调入中国科学院筹备哲学研究所，同年，哲学所成立后，他担任哲学所副所长。他调侃说，他还认真地去坐办公室，但“公”不来，他也没有“公”可办。哲学所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20世纪50年代以前，金岳霖在大学里开的课，主要是知识论、形而上学和逻辑。有的课就是他和学生一起读书，读休谟的书，读洛克的书，边读边分析，边同学生讨论。他不像冯友兰，他不喜欢哲学史，他喜欢比较纯粹的哲学思考和哲学分析。他培养了不少知名的弟子，如王浩和殷海光等。作为哲学家，金岳霖的哲学也是20世纪50年代以前奠定的。他有一个严格的工作和生活习惯，一直坚持上午思考和写作。1926年，他说：“近年来对于政治——不仅是中国的政治，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而对于哲学，颇有兴趣。”^①他还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哲学动物，这样的人，“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的哲学问题”^②。

作为一位现代中国哲学家，金岳霖建立了最为体系化的知识论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正如一开始我们就指出的那样，他在哲学上的整体倾向是实在主义。他的知识论体系主要是在西方知识论传统影响下而构建起来的。他站在实在论的立场上，接受罗素的分析方法，通过融会经验

① 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集》，15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② 金岳霖：《唯物哲学与科学》，见《金岳霖学术论文集》，16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和理性，为知识的客观性寻求坚实的基础，克服种种唯我论和主观论；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可以说是中西传统形而上学融合的产物，也是他自觉抵制现代西方反叛形而上学的结果。他启用了不少中国传统形而上学的重要范畴，并为它们赋予了新的意义。他的形而上学，确实玄之又玄。他声称他要站在他的形而上学之中，怡情、乐性，但他对人类的悲观性，又使他的形而上学不近人情。后来，他意识到了他的形而上学不易为人了解的情形。为此，他补充了对“人与自然”这一问题的思考。在知识论和形而上学之外，金岳霖还对逻辑学情有独钟，在这个最难触景生情的领域中，他体会到了它的好玩之处。他较早向中国输入了一个数理逻辑系统，提出了一个与他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具有密切关系的逻辑哲学，对最抽象的逻辑能为我们生活提供最直接的便利做出了非常有力的说明。

同他的哲学体系相对应，他主要有三部著作，一是《逻辑》（1935年），二是《论道》（1939年），三是《知识论》（1983年）。对于这三部著作，金岳霖称他最满意的是《论道》。1940年，这本书还被重庆教育部评为抗战以来最优佳学术著作之一。他花费精力最多的是《知识论》，原因之一是这部书部头大，还有就是，他好不容易写出的第一稿，在昆明跑警报中遗失了，他不得不再花费时间从头又写。冯友兰在祝贺金岳霖88岁生日时，送给金岳霖一副对联，称他的两部书“道超青牛，论高白马”，并说他们二人“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贺麟说金岳霖的《论道》“是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①。金岳霖不满意他的《逻辑》，部分原因是，他介绍罗素《数理逻辑》的那一部分有一些错误，一直没有改。他还写了不少论文，比较满意的有《手术论》等。实际上，他为拟写的逻辑学著作而写的《序》、他的《中国哲学》、他的《哲学与生活》等，都称得上是哲学思考和研究中的名篇。他的著作迄今编辑最全的是《金岳霖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作为选集主要有《金岳霖学术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道、自然与人：金岳霖英文论著全译》（三联书店，2005年）。

三、情深意长：才性哲学家

金岳霖是一位才智极高、性情单纯、天真浪漫、对万物充满着同情

^① 贺麟：《50年来的中国哲学》，2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心和对人一往情深的人，他同时兼具儒家的文雅、道家的通达和英国绅士的风度。一些哲学家的人生就能打动人，西方的苏格拉底、罗素、萨特，东方的孔子、墨子、庄子、王阳明、梁漱溟等，就是这一类人中的一部分。金岳霖的人生有着传奇的色彩，原本就是一道动人的诗。

他的人生最打动人的地方之一是他的爱情。人们常说有一种爱情，叫作“柏拉图式的爱情”，这种爱情就像柏拉图的美、善等理念那样，纯粹而又纯粹，纯粹到像陈宇说的“此情只应天上有”的境界，但“今闻竟在人间”^①。金岳霖就是这种爱情的亲证者。他爱恋的人，是徐志摩苦苦追求过、后来同梁思成终成眷属的林徽因。金岳霖认识林徽因，是他在英国时徐志摩介绍的。他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北京东总布胡同。金家和梁家住在前后独立的两个院子里，萧乾描写的“太太的客厅”指的就是后院金岳霖院的客厅，这是当时金的各种朋友“星六聚会”的地方。人们自然会想象，这个客厅的主人是“少奶奶”，可它的主人确实是一位单身男子。它之所以成了“太太的客厅”，是因为前院的林徽因常常是“星六聚会”的核心人物。在心爱的丈夫梁思成之外，林徽因同时又爱上了哲学家。林徽因将她的这一苦恼极了的情感，真诚地告诉了她的丈夫。梁思成陷入了痛苦之中，他想了一夜，得出了一个结论。第二天，他告诉妻子，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他就祝愿他们永远幸福。当哲学家听到这个结论时，他也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对林徽因说，思成是真正爱她的，他不能去伤害一位真正爱她的人。彼此的直率、真诚、一诺千金，使两家难舍难分。

爱情、友情难以两全的世间情，就在哲学家、“林下美人”的诗人、“梁上君子”的建筑学家这三位非常之人的非常之事中被打破了。他们三人成了两家是一家、一家是两家的“最好的朋友”^②。为了友情加上心灵上的纯真爱情，哲学家终身未娶。当不幸的诗人逝世时，金岳霖大哭了一次，这是哲学家一生“三次”大哭之一，另外两次的大哭，一次

① 陈宇：《暮年金岳霖忆林徽因》，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349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

② 徐鲁评论说：“他崇尚美，景仰美，却又能够完全摆脱那种凡夫俗子的占有欲，而以柏拉图式的爱，献身于他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美神’。”（徐鲁：《哲学家的爱》，见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增补本）》，35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文洁若赞美说：“我十分崇敬金岳霖教授这种完全无私的、柏拉图式的爱，也佩服梁思成那开阔的胸怀。……这真是人间最真诚而美好的关系。”（同上书，352页）